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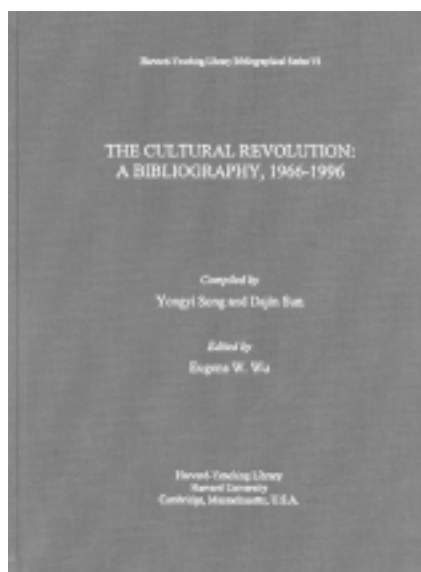
由主義知識份子，也常常輕易地放棄作為價值理性的自由，文化心理結構上的特點至少是其原因之一。換言之，如果自由尚未充分在普遍的社會心理層面展示其內在根據（即自由之所以然），那麼自由理念自身就不能真正被確定為這個民族的終極價值。

《自由的所以然》集中從中西認識論氣質上的不同來揭示中西自由主義的差異，做出了令人羨慕的學術貢獻。當然，作者評價嚴復思想個案的某些預設，包括對革命和改良、轉化和調適兩種不同路向的評判，則屬於另一個範圍更大、內涵更複雜的論爭了。

## 來自大洋彼岸的推動

### ● 印紅標

《書目索引》所編篇目是在1966-96年三十年間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論著，其中包括專著、論文、回憶、評論、工具書以及少量研究生的學位論文和口述資料，這反映了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分析思考和研究，也為讀者提供了迄今為止最為全面和權威的檢索依據。



Yongyi Song and Dajin Su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Cambridge, Mass.: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1998年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在它的圖書目錄系列中增添了一部關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

文獻目錄書——《文化大革命：書目索引，1966-1996》（*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這部書目索引的出版，不論對於西方的還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者都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情。

大凡要從事一項研究，總要下一番細緻而枯燥的查找文獻的苦功夫，而一部好的目錄書可以為研究者在浩如煙海的資料中指點迷津，使之事半功倍。文化大革命過去三十年了，相關研究雖然尚屬薄弱，但是歷年發表的有關文獻資料也有相當可觀之數，且非常分散。這部厚521頁的《文化大革命：書目索引，1966-1996》（以下簡稱《書目索引》），為讀者提供了迄今為止最為全面和權威的檢索依據。《書目索引》所編篇目是在1966-96年三十年間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論著——即那些把文化大革命當作認識對象的文獻，其中包括專著、論文、回憶、評論、工具書以及少量研究生的學

位論文和口述資料，反映了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分析思考和研究。《書目索引》並未涉及紅衛兵小報等文化大革命過程中的歷史資料，那將是另一項目錄編纂工作的任務。

《書目索引》編錄了中文、以英文為主的西文，以及日文的文獻。中文文獻以在中國大陸發表的論著為主，同時也收錄了在香港、台灣以及美國發表的中文論著。《書目索引》所列的豐富的海外中文文獻，說明了大陸之外的中國人對文革的長期關注和興趣。中文著者及篇目索引按漢語拼音字母順序排列，便於西方漢學學者和中國大陸學者查找。鑒於《書目索引》所收中文文獻蔚為大觀，而中國大陸至今不曾編輯出版文革研究文獻目錄，這部目錄也是中國學者查找中國國內文革文獻的首選工具書。書中所列英文論著目錄，反映了歐美學者多年來在文革研究領域孜孜不倦的努力及學術建樹。歐美國家，特別是美國文革學的學術水平，包括資料的收集整理、理論分析等方面佔有相當的優勢。《書目索引》並沒有忽視日文文獻，這是它的一個特點。日文文獻目錄反映出日本文革研究的狀況：文化大革命在爆發期間曾經是日本左派的熱門話題之一，而文革結束以後，中國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使日本左派處境尷尬，學術性的研究相對冷落。

長期以來，中國對海外文革研究和資料收藏的情況不甚了了，存在種種不切實際的看法。例如不斷聽人自信地斷言外國人不了解中國，所著文章無非是「隔靴搔癢」。事實是西方學者雖然有語言文化等

障礙，但是也有理論、方法、資金、交流甚至資料利用方面的長處。三十年的研究積累，已經形成不可低估的實力。相比之下，倒是在文革的發生地中國，一直缺乏正常的學術研究條件，文革歷史被人為地賦予過多的政治色彩，先是根據政治要求進行「徹底否定」的思想教育，繼而禁忌重重，迴避這段歷史，十幾年下來不僅文革研究成果不能滿足國人的要求，而且青年一代對文革的無知，已到了令人擔憂的程度。

另一種偏向是不切實際地誇大海外文革研究的資料收藏和研究水平，例如以為美國收藏的紅衛兵小報比中國收藏的還要多。實際上，文革歷史資料的最大收藏在中國，這是不爭的事實。問題是目前這些材料仍被封鎖起來，很少向研究者開放，其潛在價值得不到發揮。西方在資料方面的優勢主要是其開放性和目錄檢索系統的完善。

西方學術界，除了為數不多的文革研究專家之外，對於中國文革研究成果的了解也是十分有限的。文革研究的最大著者群和讀者群在中國，二十年來中國學者在這一領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這部《書目索引》收錄的大量中文文獻，為西方學者了解、運用中國學者的觀點和研究成果打開了一扇窗口。

《書目索引》所收篇目範圍廣泛，分為14個門類，涉及了文革的各主要方面，同時反映了編輯者對文革文獻的深入理解。在《書目索引》所列的門類中，有關於中共黨內鬥爭的，如「毛澤東與文化革命」、「中共領導與文化革命」；有關於群

長期以來，中國對海外文革研究和資料收藏的情況不甚了了。事實是西方學者三十年的研究積累，已經形成不可低估的實力。相比之下，倒是在文革的發生地中國，一直缺乏正常的學術研究條件，不僅文革研究成果不能滿足國人的要求，而且青年一代對文革的無知，已到了令人擔憂的程度。

海外文革研究之所以有如此突出的地位，實與中國國內的相關學術環境一直未能正常有關。至今，即使不籠統地說「文革在中國，文革研究在外國」，也應當說：研究文革不看中國文獻不成，不看外國文獻也不成。

眾活動的，如「紅衛兵和知青下鄉」、「造反派和群眾運動」；還有「軍隊的介入」、「各省文革」等門類。此外，對文革期間的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科學藝術以及外交等都各自列出門類，查找十分方便。《書目索引》專門闢出「異端思潮」一類，反映了近年來中外學者對文革研究的一個動向。文革期間，民間思潮曾經一度活躍，相關思想資料正吸引着海內外學者的特別關注。《書目索引》編輯者宋永毅和孫大進於1997年曾有著作《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在香港問世。1999年1月，中國又有《遇羅克遺作與回憶》在北京出版。

《書目索引》對文革題材的文學作品給予特別重視，專門列出一類，表明編輯者對中國大陸文革文獻的深入了解。中國文學一向有關注現實的傳統，改革開放之初，盧新華的小說《傷痕》等一批文學作品不僅開創了文學史上以「傷痕文學」命名的新階段，而且帶動了全民族對文革的反思和再認識。80年代末期以來，文革題材的文學作品又有深一步的意義。有關方面對文革題材的著作嚴格審批，致令出版非常困難，而對於文學類作品則沒有作特別規定，故而許多文革題材的文學作品，特別是報告文學得以大量面世，甚至一些本來可以是歷史學的著作，也以文學的形式出版，例如圖們、祝東力的《康生與「內人黨」冤案》即是亦文亦史，馮驥才的《一百個人的十年》是文學，但也是很好的口述歷史。這些文學作品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和思想資料。從此處可見《書目索引》編者的獨具匠心。

如同所有的目錄書一樣，這本《書目索引》也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例如在日文文獻中沒有收入《中國文化大革命事典》(日文)，這是由中國學者陳東林主編，日本學者加加美光行監修，德澄雅彥監譯，由日本福岡中國書店出版的1,125頁的大型工具書。此外，在目錄中亦有個別印刷的疏漏。但是瑕不掩瑜，《書目索引》無疑是迄今最好的文革文獻目錄書。

《書目索引》所列文獻顯示，文化大革命研究已經是世界性的學術領域。三十年前中國文化大革命震動了世界，60-70年代，歐美日本的左翼運動或多或少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從那以後，對文化大革命的關注就不限於中國一國的範圍。海外文革研究之所以有如此突出的地位，實與中國國內的相關學術環境一直未能正常有關。至今，即使不籠統地說「文革在中國，文革研究在外國」，也應當說：研究文革不看中國文獻不成，不看外國文獻也不成。《書目索引》在美國的出版再一次說明了這一點。

文革研究在香港和海外華僑華人中是一個經久不衰的熱點，瀏覽海外學人的電子雜誌《華夏文摘》便不難感知其作者、讀者群的濃厚文革情結。《華夏文摘》已經響應巴金先生的倡議，建立了「網上文革博物館」。這種現象有其歷史原因：香港在文革期間因本地社會矛盾以及內地政治運動的影響而發生社會動盪以至暴亂；歸國華僑身受運動之害，其本人及親屬有切膚之痛；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以後赴歐美日本留學的大批學子和新移民大多有

文革經歷，有些人還是文革中的風雲人物，文革是他們生命歷程中難以忘懷的一部分。例如現居美國的駱小海曾是清華附中紅衛兵著名的三論造反精神大字報的起草者；定居澳大利亞的楊小凱曾是著名「異端」思潮代表作湖南省無聯〈中國向何處去？〉的作者；這部《書目索引》的編輯者宋永毅，文革期間也曾有過類似參與和受迫害的經歷。今天，不論他們是否保留中國國籍，他們的回憶、思考和研究，都是中國和世界文革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現今的世界文革研究可以說有三支隊伍：一支是中國的學者；一

支是西方的學者；第三支就是海外華僑華人學者，北京一家雜誌稱其為文革研究的「第三軍團」。這支「第三軍團」以其中國歷史文化背景見長於西方學者，又以其自由的學術環境、較為優裕的資金來源見長於中國學者，故而學術成果顯著。據了解，主要由旅美華人學者宋永毅、周原、丁抒、王友琴等人編纂的影印文革歷史資料彙編《新編紅衛兵資料》，將從1999年開始由美國的中國研究資料中心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陸續出版大約一百卷。相信這部《書目索引》將如其編輯者所期待的那樣，能夠給予世界範圍的文革研究一個有力的推動。

## 張玉法著《中華民國史稿》簡介

### ● 鄭會欣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近二十年來，隨着大量原始檔案的陸續開放，海峽兩岸意識形態也不同程度地有所寬鬆，因而有關民國歷史的研究已由「險學」變為「顯學」，成為眾多歷史學家共同關心的一個熱點。張玉法教授的新著《中華民國史稿》正是這一研究趨勢的顯著標誌。

近二十年來，隨着大量原始檔案的陸續開放，海峽兩岸意識形態也不同程度地有所寬鬆，因而有關民國歷史的研究已由「險學」變為「顯學」，成為眾多歷史學家共同關心的一個熱點。張玉法教授的新著正是這一研究趨勢的顯著標誌。